

宋史十五讲

游彪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YZLI0890112688

宋史十五讲

游彪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YZLI089011268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史十五讲 / 游彪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506-0084-3

I. ①宋… II. ①游… III. ①中国—古代史—宋代
IV. ①K2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6070号

- 书 名 宋史十五讲
著 者 游 彪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邮编:212212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84-3
定 价 27.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8420818)

序 言

史学工作者探索的是过往的世界，因而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毕竟，他们并不生活在过去的时代，根本无从亲身经历此前出现过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便是当代人看待眼下发生的事情，也还是见仁见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太可能完全一致的。进而言之，中国古代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后人对前代的认知除了依据现存的史料而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如同猜谜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想彻底复原历史都是不可能的，毕竟，现代人能够见到的都是过去的点滴，甚至仅仅只是碎片而已，要以这些散乱而零碎的部件重新构建历史的大厦，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历朝历代的历史无论如何是需要尽可能地弄清楚的，这也是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历史的进程是异常复杂的，如果简单地以某种模式加以归纳或是总结，都是无助于找寻事实真相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研究历史是不能放过任何细节的，只有尽力弄清历史发展的每个环节，才有可能再现过去的种种面相，也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不同时期无疑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也有与其时代相应的风貌，这些是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人和事。正因如此，仅仅凭借个人之力是很难弄清如此长时段内所出现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读完浩如烟海的史籍，于是史学界才有了断代史、专门史之类的学科分类。在这种情况下，后世学者对历史的认知大体上只能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因此，当史学工作者从事某个时代或某一领域的具体研究时，往往是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的，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

很多学者大凡都会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抱持美好的愿望，如研究汉代和唐代或是其他时段的学者多是肯定该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如何如何的位置，也就是说，正面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主流，反而忽略了某些所谓非主流的历史现象。显而易见，这种情形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并不是十分有利的。

也许是愚钝的缘故，笔者对断代史的理解无疑是粗浅的，尽管从事宋代研究已经多年，但自我感觉似乎仍然是门外汉，尤其是在与学生一起逐字逐句地解读有关宋代的典籍之时，很多史料读过多次，每次都会碰到不解的字词，好多看似理解的文献，却有些似懂非懂，要作出精准的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困难的。其原因在于，古人在记录历史或是书写其他文献时有其特定的环境和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古人需要为尊者、长者甚至是死者讳，因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歧义或者说是很容易理解的文字，却极有可能给后人留下完全不同的看法。举例而言，宋朝在选拔管理佛教和道教事务的僧官、道官之时，宋真宗专门颁布诏令，要求其前提条件是“行业优长者”，^①毫无疑问，宋人应该是完全能了解其中涵意的，否则他们将无法按照皇帝的旨意进行实际操作，毕竟这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其属下臣僚必须无条件地加以遵从。然而，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对于现代学者而言，其解读却是相当困难的。关于“行”与“业”，前者自然是指德行，后者应该是其在佛教、道教方面的造诣。实际上，要是细致地考究起来，两者都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间，即以何种标准或是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其所谓的“优长”，虽然能够意会其字面意思，但却是让人无法确定的问题。应该说，从具体选拔的过程来看，来人大体上不会出现疑虑和困惑，反而是后世之人由于不能身临其境而难解其确切含义。由此可知，解读历史语言是必须要考量其语境的，即后来人需要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上当事人的立场，方才有可能领悟史料及其周遭的状况。

近年来，学术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要达成这一目标，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方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史学界自然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历史研究几十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应该看到，很多史实是有待进一步厘清的，也有很多领域是需要不断开拓的。就宋代研究而言，虽然有众

^① 《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1。

多典籍流传至今，足以应付相关专题的探讨，但以前似乎更多关注史料本身的意含，而忽略了对史料背后及其周边情形的解析和追究，这种状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史料的解读还远远不够精细，因而很难梳理其潜在的重要价值。平心而论，相对于宋代研究，无论是隋唐史，还是明清史，学界都非常重视正史之外的史料，如金石文字，等等。长此以往，若不能充分挖掘此前关注不够的史料，那么，这对于拓展宋代研究的新领域是极为不利的。

在中国古代，两宋时期无疑是有其重要地位的，虽然其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以及后来的元明清各朝，但其文治却是众所周知的高度发达。大体上可以说，宋代奠定了此后中华民族此后文化发展的基础，甚至一直延伸到了中国的近现代。一方面，宋代确定下来的很多制度被后代所沿用，如科举考试的各种规范实际上都是在宋朝完善起来的，等等。这些体制化的设计既是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无疑也是宋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宋学是影响至为深远的理论系统，并渐渐渗透了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宋儒所阐发之“微言大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人待人接物的重要标尺。更重要的是，宋人的文明程度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值得称道的，甚至可以说，宋代的中国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文明都是首屈一指的，取得了令全世界人羡慕的巨大成就。有鉴于此，不断推进宋代之研究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当然，两宋社会也不全然都是辉煌的，其中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宋人及其此后各代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总结。众所周知的是，宋代武功之不振，在面对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时，宋人似乎缺少防范和抵御的能力，每每处于下风，更为严重的是，北宋、南宋为女真族、蒙古族所灭亡，这对于宋人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也促使他们不断反思，因而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与战一直是贯穿两宋历史的主线之一。通常而言，国力之强盛往往意味着军力之强大，而宋朝恰恰打破了这种观念，姑且不管出现这种状况的缘由，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由此可知，宋代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一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询的。

拉杂写了这些，姑且算作是序言吧。

2010年9月16日

于北师大茹退居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讲 防弊之策：宋初政局之走向与祖宗家法之确立 / 1

- 一、杯酒释兵权 2
- 二、宰相须用读书人 6
- 三、“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9
- 四、天书封禅与真宗朝政局 13

第二讲 除旧布新：北宋中后期政争的得与失 / 18

- 一、熙宁变法的开端和主要内容 18
- 二、熙宁变法的失败与神宗朝政局 25
- 三、哲宗时期的党争 30

第三讲 靖康之变：艺术天才和政权的危机 / 40

- 一、错位的天才 40
- 二、靖康之变 50

第四讲 失去天堑：北宋与辽朝、西夏王朝之鼎立 / 58

- 一、割让“燕云十六州”：防御北方游牧部族地理优势的丧失 58
- 二、梦想破灭：宋太祖、太宗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历程 61
- 三、澶渊之盟：宋辽间长期和平协议签订 66
- 四、和平相处下的斗争与制衡 68
- 五、联金灭辽：众说纷纭的历史选择 69
- 六、时战时和：复杂多变的宋夏关系 71

第五讲 收拾旧山河：南宋初年的和与战 / 79

- 一、南宋建立与高宗南逃 79
- 二、“中兴十三处战功” 83
- 三、中兴四将 89
- 四、绍兴和议 94

第六讲 强敌压境：南宋与蒙古的长期周旋 / 97

- 一、蒙古部族的兴起与南宋的端平入洛 97
- 二、第一次宋蒙战争 99
- 三、钓鱼城之战 101
- 四、襄樊保卫战 104

第七讲 厓山之战：赵宋政权的彻底覆灭 / 108

- 一、贾似道当权与南宋持续衰落 108
- 二、孤儿寡母的朝廷 116
- 三、厓山悲歌 125

第八讲 重文抑武：赵宋皇帝的价值取向 / 131

- 一、北宋建立与“重文抑武”国策形成 131

- 二、文人地位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 137
- 三、狄青、王德用、种世衡：被压抑、迫害武将的缩影 139

第九讲 募兵体制：维系政权的理想与现实 / 147

- 一、居安思危与募兵制的确立 147
- 二、募兵制度造成北宋兵力不振 150
- 三、不堪一击的北宋募兵与靖康之难 152
- 四、常胜军和义胜军：助纣为虐的募兵 153

第十讲 集权与分权：宋朝政治制度的演进 / 156

- 一、宋代地方政治制度演进 157
- 二、宋代的中央政治格局 160
- 三、宋代的皇权 167

第十一讲 宋学：传统学术的新气象 / 170

- 一、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170
- 二、宋学的基本范畴及特点 172
- 三、宋学的形成与发展 175

第十二讲 词、文与诗：宋人的文学成就 / 187

- 一、宋诗 187
- 二、宋词 194
- 三、宋代的散文 199

第十三讲 发明与创造：宋朝的科技革命 / 205

- 一、三大发明及相关科技的运用和发展 205
- 二、天文学 209
- 三、数学 211

四、医学	212
五、建筑	215
六、冶金技术	217
七、造船技术	219

第十四讲 古史与当代史：繁荣的宋代史学 / 221

一、宋代的修史机构	221
二、古代史	225
三、当代史	232
四、地方志	235
五、历史文献学发展	236

第十五讲 宋人的遗产：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 240

一、绘画	240
二、宋代书法	251
三、工艺美术	254

后 记	260
-----------	-----

第一讲

防弊之策：宋初政局之走向与祖宗家法之确立

纵观中国历史，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仅靠一次兵变就黄袍加身的例子并不多见。与五代这样混乱的时代相比，赵匡胤夺得天下的过程显得过于容易。五代时安重荣曾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①陈桥兵变之前，赵匡胤不过是一名统率禁军的高级将领，完全不是兵强马壮的藩镇。整个兵变过程，只杀了一个韩通，如此顺利地夺得皇位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然而，得天下容易并不意味着坐天下也一帆风顺，相反，因为之前太过顺利，在当皇帝后反而需要更加谨慎小心。这是因为，皇位来得容易就意味着也很容易失去，因而宋太祖登基之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兵权”。另外，赵匡胤登基之前自身的地位、声望都不足，面对以前的同僚和上司，难免心中会惴惴不安，必须小心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王夫之在《宋论》中就说：“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②正是这样的恐惧心态，使得宋初的帝王们殚精竭虑地治理天下，避免了宋朝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开创了之后的长治久安。而宋初几代帝王的做法也被赵氏子孙奉为“祖宗家法”，视为立国之根本。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祖宗家法，并不是一套明确的制度，而是由一系列的原则和做法组成的相对模糊的概念，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在不



宋太祖像

① 《旧五代史》卷 98《安重荣传》。

② 《宋论》卷 1。

断被改造和重新阐释。祖宗家法确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所谓“宋制”形成的过程。一个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制度会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宋初尤其如此。新的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应对政局变化的过程中逐渐总结、改变的。

一、杯酒释兵权

宋王朝之建国立制,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革前代之弊,如何避免成为像前代一样的短命王朝,是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五代皇权政治有两大威胁,一是所谓“腹心之患”的禁军,一是“肢体之患”的藩镇。赵匡胤能当上皇帝依靠的是前者,后者则是唐中期以来的政治痼疾。五代时期可以说是典型的武人政治,兵强马壮是夺取政权的关键,要改变这样的游戏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收兵权”,也就是要更新统兵体制,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这一长期以来形成的祸患。

“杯酒释兵权”被后人视为赵匡胤收兵权时所采取巧妙手段,同时也常被用来赞颂赵匡胤没有如其他朝代那样诛杀功臣的仁慈。事实上,所谓“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收兵权的措施之一,针对的是“腹心之患”的禁军,实际的情况则远比收回兵权本身要复杂得多。先看“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关于“释兵权”的过程,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卷一中有绘声绘影的描述。

宋太祖一天退朝后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石、王都是禁军主要将领,在后周时期就与赵匡胤共同掌管禁军,也是所谓“义社十兄弟”的成员,这十兄弟是赵匡胤起家所倚重的核心干将,也是他能够当上皇帝的最为关键的力量。当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屏退左右,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赵匡胤的这几句话讲得十分巧妙,先是承认石、王等人的功劳,暗示自己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又说做天子不如做地方的节度使,做天子总是睡不好觉。石、王等人自然要问为什么,赵匡胤的回答一语道破天机:“居次位者,谁不欲为之?”意思是说,谁不想做天下第一的皇帝而位居其次呢,这无疑是在宋太祖真实意思的表露。石守信等人连忙起身跪下,连声否认。赵匡胤接着又说:“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

欲者何？一旦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这是诛心之言，石守信等人能做的只是不断叩首，祈求皇帝指示一条出路。赵匡胤这才和盘托出了自己藏在内心的想法：“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①赵匡胤的策略十分明确，就是以厚禄换取诸大将交出兵权。

这样生动的场景可以和司马迁所描写的“鸿门宴”相比，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故事其实更多地是一种象征。事实上，所谓“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开始收兵权的步骤，这种收回禁军大将兵权的做法其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分了好几个阶段，进行了若干次，并非一蹴而就。而这一做法的实质是以金银、田宅、官爵、婚姻为代价，采取利益交换的方式和平转移大将兵权，这样的做法后来也成为赵宋王朝对待战功卓著的宿将的主要做法，南宋初宋高宗对韩世忠等大将做法也是如此，唯有岳飞是例外。

“杯酒释兵权”之后，摆在宋太祖面前更为艰巨的任务是要防止禁军中继续出现能威胁皇权的人物，因而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第一，将全国的禁军两司分为三衙，不再设最高统帅的都点检一职。作为皇帝的亲兵，禁军在后周时分为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其最高长官分别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前者是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前的军职。入宋后，侍卫亲军司被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兵权和兵力都被大大分散，以相互牵制。三衙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开始是阙而不授，以职位较低、资望较浅的武将负责实际事务，直至取消该职位。第二，将发兵权与握兵权和统兵权相分离。枢密院有发兵之权，天下的兵籍、武官任命与升降等政令全部由枢密院来发布，但枢密院手下并无军队。三衙平时负责对禁军训练和管理，却无发兵之权。需要部队出征时，皇帝临时委派将领，避免军队成为将领私人的武装。这种做法为后代所承袭，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相比于禁军这一“腹心之患”，收藩镇之权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自唐代设置节度使以来，藩镇问题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藩镇之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祸绵延百余年。对此，宋初君臣采取的措施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实际上，唐代藩镇问题的核心包括两方面，一是藩镇管辖地区军事权与行政权合一，有了行政权，藩镇就把持了地方的土地、人民、赋税，有充足的财力养兵；二是地方握有重兵而中央却没有一支能威慑全局的武装。因此，收藩镇之权的重点是要多管齐下，收兵权的同时还应收其财权。

其具体措施是：第一，整顿军队，以收地方精兵。后周时就要求地方藩镇选精兵增补到中央禁军。宋初继承了这一做法，对军队实行拣选制度，挑选精壮的士兵为禁军，将老弱病残的禁军送到地方成为厢军，再将地方上强壮的厢军选到禁军，补充缺额。宋代厢军原本是州郡地方兵，后来逐渐演变成杂役兵，不再参加战斗，只负责看守仓库、运送官物、修筑河道等任务，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第二，在兵力部署上实行内外相制。宋太祖时期在京城养兵十余万，地方养兵十余万，“使京师之兵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②。唐代“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内外兵力不平衡。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十中认为宋代兵力部署策略是“守内虚外”，即兵力集中于内。此说值得商榷，虽然宋代京师驻军保持了相当的数量，但同时为了应付边患，也在边境保持了相当的兵力。在宋初，为了统一天下，军队会持续调往边境；到太宗后期，契丹军队不断南下，北宋不得不将重兵驻扎于宋辽边境；仁宗时期，宋与西夏连年征战，重兵长年部署于西北边境；南宋时，赵宋偏安一隅，前有金朝威胁，后有蒙元不断南侵，更不可能实行“虚外”政策。因此基本上有宋一代，大致还是沿袭内外相制的策略。

第三，收地方财权。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财权掌握在节度使手中。收财权的第一步就是中央任命官员收回由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权。宋代地方分路、州、县三级，宋初在诸路设置转运使，负责将地方财赋收入运往中央；在州一级设置通判，负责监察地方财务账目，以牵制地方长官。第二步就是将天下财赋的支配权集中于中央，没有中央同意，地方不得擅自支配。天下州军的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② 《太平治迹统类》卷30。

财赋收入必须由中央规定其得以支用的项目与数额，诸州军除中央规定运用的各项经费之外，其他一切财赋，地方均不得动用。

第四，派遣文官到地方作知州、知县，逐渐剥夺节度使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权。宋代的知州，全称“知军州事”，《文献通考》卷六三中有一段简要的叙述：“宋太祖开基，革五季之患，召诸镇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号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这段话简述了宋太祖利用朝臣出任知州以削夺藩镇之权的过程，赵匡胤一方面将诸镇节度使集中到京师，予以高官厚禄和宅第，另一方面派遣朝臣（主要是文臣）到各州，掌管军政和民政。宋人将知州之设视作赵匡胤的一大发明，但实际上知州制度之形成，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五代时就已有知州之名，通常是临时差派，并未制度化。宋初统一战争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一次性解除节度使的兵权也是不现实的，实际状况只能是逐步进行。宋太祖开始先是命令新夺取的各州直属朝廷，不再归属藩镇，然后利用各种机会向已有藩镇派遣文臣“权知州事”，这个过程在太宗朝也一直持续进行。直至真宗时期，知州制才全面确定下来，其后节度使通常不再到本镇，最终成为代表崇高级别、优厚待遇的荣誉职衔。

宋初收兵权的过程也是藩镇割据局面结束的过程，相比于军事层面的统一战争，制度建设更加重要，改变五代以来的游戏规则，才是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代”的关键。这一过程也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努力才基本完成。本质上是军阀出身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依靠自身掌握的军事实力，通过兵变上台，这是五代时期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对于五代时政权频繁更迭的教训心有余悸，在夺取政权后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汲取了历史的经验，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防止新的动乱的出现。这些措施虽然是以武力作后盾的，但实施过程却很少兵戎相见。赵氏兄弟出身卑微，重视优容武将，对元老勋臣除了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外，还与其联姻以保持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因而逐渐保持了政治局势的稳定。

收兵权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设计一套制度以防新威胁的出现才是重中之重，这就是赵氏兄弟和他们的臣子一起完善的所谓“二府”体制。二府是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者共同构成政权中枢机构的核心。二府对举的局面在五代其实已露端倪，宋初则加以完善。中

书门下简称中书,是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机构,其办公场所被称作“政事堂”。北宋前期官衔中带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就是宰相,太祖乾德年间又设置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一方面辅佐宰相,另一方面也起着牵制宰相的作用。枢密院在唐代本是宦官机构,随着宦官权利的扩大而地位日渐上升,掌握了兵权,五代时枢密院长官一般是皇帝亲信,其权力之大,有时甚至超过了宰相。北宋枢密院负责统理军机要务,是国家的最高军政机构,长官称作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是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这一体制的核心就是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行政权与军事权的平衡,具体到两府内部则又有正副长官的权力平衡,枢密院和三衙还有调兵和管军的平衡。鉴于前代的教训,宋初还是以防止兵权旁落为主,宋太祖特别重视枢密院长官的人选,不论文武都必须是皇帝信任的人。由于国内尚未统一,因而武将中依然有不少人出任枢密院长官,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枢密院长官开始倾向于专用文臣,文臣掌兵,也是一种平衡,当这一做法制度化后,武将专权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仁宗朝,狄青因功升任枢密副使,文臣群起而攻之,原因不在于狄青个人,而在于破坏了原先制度设计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以效率的降低为代价的,战争一旦爆发,这种互相牵制的制度设计会延误战机,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二、宰相须用读书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太祖的第二个年号名为“乾德”,确定年号之时,赵匡胤就要求宰相们要找一个前代没有使用过的。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后蜀宫女被充实到赵匡胤的后宫,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赵匡胤发现一个宫女的镜子背后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于是大惊,问遍了数位宰相都得不到解答,后来还是翰林学士窦仪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前蜀王衍的年号也叫“乾德”,镜子是那时铸造的,宋太祖因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这个故事受到宋代士大夫的竭力渲染,奉为“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个故事本身颇有可疑之处,但采用文臣治国的确是宋初为了走出五代纷乱局面的重要一步。宋代被认为是重文轻武的时

期，但在宋初，实际上重文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使文武官员各司其职，逐渐将武将手中的行政权和财权交到文臣手中，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毕竟历代都是马上得天下，但没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宋太祖不但说“宰相须用读书人”，还多次“欲武臣读书”，而且自己也勤于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代史书，经常读书至深夜，称读书能增广见闻。这一系列行动的目的其实是要树立一个提倡读书的趋向，更重要的是借此来重建君臣秩序。五代时期，各路豪强凭借强大的武力争斗不已，胜者为王，君不君，臣不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要改变这一状况，宋初君臣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文治，倡导武臣读书和选择读书人为宰相都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指出的是，文治的目的依然是重建统治秩序，巩固赵宋江山，而非单纯地提高文臣地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坐论之礼”的废除，所谓“坐论之礼”就是前代宰相面见天子商议政事时，天子一般会赐座、赐茶，一方面是对宰相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宰相可以从容地在天子面前表达意见。北宋建国后，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都是后周旧臣，地位原先都在赵匡胤之上，在皇帝面前难免战战兢兢，每次奏事都是事先写好札子，面见皇帝时也不敢坐下，也不随便发表意见，久而久之，皇帝也就不再赐座给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从此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了。

要实行文治，需要大批人才，扩大科举取士就成为一个重要途径。唐宋两代虽然都实行科举制，但录取人数的多少相差悬殊。据研究，唐代科举包括常举和制举在内，每举录取人数很少超过百名。以进士为例，最多的时候，一次不过七八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人，甚至有全部落榜的例子。对于科举出身者所授的官职也不高，即使考中进士高科，也只能授从九品的县尉。这种情况经过五代到宋太祖时期都没有改变。然而，宋太宗即位后，科举录取人数有了一个爆炸性增长，所授官职也比以前要优厚得多。太平兴国二年（977），是太宗即位后所举行的第一次科举，共录取进士、诸科人数达五百名之多，相当于太祖朝每年取士人数的二十五倍，前几名会授予从八品的将作监丞、正九品的大理评事等官职。扩大科举取士，使得科举出身



實儀《進刑統表》